

司馬遷的盛世之憂與庶民情結

馬 彪
BIAO MA

《史記》真的很偉大，它不僅是文人眼中的天才之作、千古絕唱，而且是一部頗受庶民百姓喜愛的歷史讀物。

一、一部最適合老百姓閱讀的“正史”

中國的老百姓不論老少婦孺，除了《三國》、《水滸》、《紅樓夢》之外，隨手拈來的上古歷史故事中十有八九來自《史記》：完璧歸趙、胡服騎射、伯樂相馬、毛遂自薦、河伯娶妻、荊軻刺秦、指鹿為馬、鴻門之宴、四面楚歌、霸王別姬、韓信點兵、張騫通西域等比比皆是。

《史記》可謂中國文化宴席上的一道大菜，而且是一道特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大餐。至少在《正史》之中適合老百姓閱讀的，恐怕只有《史記》了。

為什麼《史記》能夠如此雅俗共賞呢？這也許是個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問題。在大學執教秦漢史的二十餘年來，經常有學生問我：“《史記》應該怎樣讀？”。我總是回答說：“《史記》就像一套巨大的連環畫，只要你知道了作者的主導思想和全書的篇章結構，隨心所欲地去讀就是了。”

就我個人的體會而言，司馬遷的盛世之憂最為文人所認可，《史記》中到處顯現的庶民情結最為打動尋常百姓心弦！然而，全書新穎而嚴謹的篇章結構又是作者思想、感情得以充分表達的硬件設備。

二、司馬遷的身世及其對《史記》撰述的影響

還有一個問題是學生經常問到的，即司馬遷到底是不是宦官？

作為太史令司馬遷繼其父司馬談之後擔任過史官，所以司馬遷首先是史官；但他又在受宮刑後出任了中書令一職，中書令在漢武帝時期又的確由宦官擔任，所以說他是宦官並不為錯。

不過，因為司馬遷並不是從一開始就以宦者身份進入官場的，所以歷代學者並不把他列為宦官。

（一）建議先讀《太史公自序》

為了了解作者身世及作品背景、時代，建議讀者先讀一下《太史公自序》。古人的書序不像我們今天是放在書的開頭而是放在書尾，《太史公自序》亦不例外。不過，今人閱讀《史記》當然還是按照今日的習慣，先讀《太史公自序》為好。

序中不但闡述了《史記》的編纂旨趣，而且敘述了司馬氏的家傳。

司馬遷生活於西漢的武帝盛世，他於景帝中五年（前一四五年，一說前一三五年）出生於龍門（今陝西省韓城市），比漢武帝小十一歲，二人是同時代人。漢武帝十六歲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是秦漢時期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他統治的半個世紀不僅限於秦漢朝，在整部中國史上也堪稱盛世。

這位“雄材大略”（《漢書·武帝紀》）的皇帝所創功績數不勝數：以罷黜百家統一了思想意識，用削藩推恩加強了中央集權，以平準專賣充實了國家財政，此外還加強軍備解除了匈奴邊患並擴張了帝國版圖，使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與西方羅馬帝國並立的東方大帝國。

（二）生逢盛世的父子兩代“太史令”

司馬談在武帝朝的前半期任職太史令約三十年之久，其子司馬遷亦任太史令九年。“太史”，是漢朝執掌宗廟、禮儀之官太常的下屬史官；“令”，即長官，俸祿為六百石，相當於地方上縣的長官。司馬談因未能參加漢武帝封禪泰山的祭祀“發憤且卒”（《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死於何年史無明文記載，一般認為約在武帝之死前後。司馬父子二人最大的成就是編纂了中國第一部真正的史書《史記》。他們為何要修史呢？第一，他們有一種盛世修史的意識。司馬談就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司馬遷也說過：“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這些話中雖然可能參雜敷衍之詞，但二人認為身處海內一統之盛世，作為史官而記載歷史締造者的事跡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第二，《史記》是由司馬談提出計劃，而主要由司馬遷總其成的。

（三）闡述歷史進程之中的“大義”

雖然很難分清父子二人誰寫作的部分更多，但父子二人的指導思想不盡相同是肯定的：司馬談主張道家，司馬遷則是奉行董仲舒的儒家公羊春秋學理念。所以就《史記》的主導精神而言，貫徹的還是儒家的理念。

司馬遷有意識地秉承了孔子著《春秋》為的是明“大義”的精神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決定了《史記》不可能是那種阿諛明主、謳歌盛世的御用作品，相反為了尊重並闡述歷史進程之中的“大義”，即我們今天所說的歷史規律，司馬遷不得不經常以那些不致遭受批判的“微言”來表示自己的盛世之憂。

這是我們在讀《史記》時最應該注意的。那麼，司馬遷又是如何在如實記述盛世及其由來的同時，表達史家在總結歷史規律之後發出的警世恒言的呢？

三、司馬遷的盛世之憂

二〇一〇年春，我應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之邀，在巴黎第七大學做訪問學者時曾參觀了奧賽美術館，在一幅巨大的群裸油畫面前我站了許久……

（一）“世人皆醉我獨醒”的盛世感傷

幾十個近乎全裸的俊男靚女醉臥於豪華的殿堂，散亂的酒器、一絲不挂的男女美體給人以視覺上的極大衝擊，展現了一幅集體縱欲之後的場面；不止於此，畫面的右下角還繪有兩位衣冠整齊的年輕人，顯然他們是這場肉宴的旁觀者，從穿着、用色上看，這二位與畫面的主人公並不協調！直覺告訴我這一定是作者的某種刻意的追求，解說詞驗證了我的直覺：作品描述的是法國七月革命勝利後人們沉浸於縱情歡樂之中的場景，兩位年輕人在冷眼旁觀。

我恍然大悟：作品表現了作者的盛世之憂！這不正是兩千年前的司馬遷寫《史記》時的心情嗎？那種世人皆醉我獨醒的複雜心情，總是這樣不拘國境、穿越歷史地無處不在！

（二）如何讀解司馬遷著史的心境

司馬遷到底是以怎樣一種心情寫《史記》的呢？先來看看他所生活的時代：

漢武帝時期是繼漢初“文景之治”之後迎來的國家經濟的繁榮期，當時的人們終日追逐“利”、“祿”而樂此不疲。這是一個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大有作為的、積極向上的時代，可謂中國史上空前的大好時光。

然而，在今天看來當時所謂生逢其時的人們真的很幸福嗎？《史記》中專門設置有《貨殖列傳》和《平準書》，二者相互參閱可以得到答案。

前者通過春秋以來著名商人如早期的范蠡、子貢，晚期的孔氏、任氏的類傳，描述了漢代經濟繁榮的歷史形成。開篇就引用了老子“至治之極”的話，說雖然老子認為盛世就應當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考察歷史的話事實恰恰相反：中國地大物博，風土物產差異之大帶來商業物流的發達，百姓因此得便、商人由此獲利，各得其所無可厚非。但是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的盛世繁榮景象之下，腰纏萬貫的商人們幸福嗎？司馬遷是史家不是評論家，但他又不是單純記錄史實的書記員，所以他的議論雖偶爾會在“太史公曰”中言及，但幾乎都是寓於紀實之中的。

比如他為當時的商人起名為“素封”，說他們是富比封侯而沒有受人尊重身份的老百姓。他們所從事的商業是“賤行”、“惡業”。在《平準書》中又記載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司馬遷雖然沒有進行評論，但他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唯“利”是圖的拜金主義“天下”，牟利的佼佼者是那些著名的商人，他們絕不缺錢，可惜沒有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所以他們並不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在這裏並非指責商人，而是在探尋造成如此盛世之弊的深層原因。寫出了那個時代不僅使人民之間相互爭利，而且官亦與人民爭利的情况。意在指出此乃自古以來財政之中最下等之政策。即《貨殖列傳》所云，富有三階段：“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暗示當時人人爭利的“盛世”，為自古以來財政之最下等政策所致！

他尤其反對官與民爭利，讀《史記》者恐怕無人不會自然地聯繫自身所處的時代及其弊端，這是盛世之中惟有史家最清醒的明顯一例。

（三）“武帝”之謚號未必是讚美

漢武帝死後謚號為“孝武皇帝”。《謚法》：“威強睿德曰武。”就是說，威嚴、堅強、明智、仁德叫做“武”。總之，是讚揚他在位統治的武功文治。漢武帝的武功是使漢朝得以昌盛的重要條件，他派衛青、霍去病、李廣利、張騫取得了對匈奴的歷史性勝利，基本解決了漢初以來中原所受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而且拓廣了東方通往西方的文化交流之路——絲綢之路。他還用兵南越、西南夷、朝鮮，擴大了帝國版圖。

雖說我們無法用近代以來的領土概念去衡量古人，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即便在古代，武力擴張版圖也是對外國、外族的非正義戰爭。那麼，司馬遷是如何從史家的立場看待“武功”的呢？

《史記》中涉及武帝用兵匈奴的記載，至少有《韓長孺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衛青霍去病列傳》、《平準書》等，雖然司馬遷沒有任何直接的評論，但我們還是能看出在他的記述中流露出對漢匈戰爭的反感。例如，《匈奴列傳》：“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記述了漢征匈奴的沉重代價和兩敗俱傷的結果。

事實上，即便漢武帝本人也在晚年下《輪臺罪己詔》曰：“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

朕心。”（《漢書·西域傳》）表達了對自己窮兵黷武的懺悔。《史記·朝鮮列傳》記載武帝派軍隊攻打朝鮮的情況，司馬遷通過對漢軍內部種種混亂的記述，表示了對這次戰爭的批判態度。

（四）出自“大一統”思想的反侵略意識

司馬遷反對征服周邊民族的觀點又出自其儒家“大一統”的思想。

孔子以來，特別是業師董仲舒對“大一統”思想的提倡，可以說是司馬遷著述《史記》的基本理念。

如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史記》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漢書·司馬遷傳》）的追求亦出於此，目的在於從歷史發展的規律上弄清秦朝特別是漢朝“大一統”天下形成的原因，並由此指明“大一統”世界的今後方向。

董仲舒、司馬遷的時代，還沒有王莽以後那種鄙視周邊民族的“華夷之辨”思想，在儒家“大一統”精神之下，《史記》中體現了各族同源同種的民族觀念。司馬遷敘史以黃帝為人文始祖，即便匈奴亦不例外。所以他在《匈奴列傳》的開頭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明確將其列入華夏族之中。在《東越列傳》、《南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中也都貫穿了各族同源的意識。

在這種歷史觀、民族觀的指導下，司馬遷首創“正史”為少數民族立傳的史體，而且他將少數民族史傳與歷代名臣列傳交錯並列，體現了各族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由此，他很自然地記述了尉佗入南越、衛滿之朝鮮、莊蹻移居西南夷的歷史。因此，他對漢武帝一改漢初無為而治國策，轉而頻繁對周邊各族用兵的歷史雖有記載，卻無讚揚！

為了個人利益可以殺人越貨，追求所謂“國家利益”則不惜屠城滅國。在“近代化”就是“戰爭化”的今日，以所謂“正義之師”出兵他國的行為已經隨着全球化的浪潮而普遍化，其死傷人數足以令古人矚目。生活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在讀司馬遷當年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時，只有汗顏、自愧了。

（五）對獎掖學者為官之策的憤慨

漢朝於“文治”方面最突出的貢獻莫過於“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漢書·董仲舒傳》），而且這一切又“皆自仲舒發之”而被武帝採納推行。儘管如此，司馬遷並沒有對此大唱讚歌，而是處處表現出自己的擔憂。《史記·儒林列傳》是司馬遷為當時“文治”所推崇的儒學、儒士所設置的專傳，其中對公孫弘獎掖學者為官之策的實施表現出極大的憤慨。

在司馬遷看來，這意味着從此學者將學問作為獲取利祿的工具，實際上使學問喪失了尊嚴。他通過對學問、學者的歷史考察之後指出，以往學者被起用時或為天子、諸侯之師，或為士大夫之友，起到了以學問進行告誡、教誨的作用；若不見起用就隱居不出，縱令出世亦保持不輕視己道的覺悟。然而，自公孫弘為學者開闢利祿之路，學者就失去了以傳道維持教化的作用，而僅剩下記憶古事已備為政君主諮詢的作用了。

兩千年之後的學問有了極大的變化，學者也早已經把學問做出了書齋、課堂，做上了影視、網絡，“傳媒”不僅將學問更廣泛地傳播至大眾，也將學問極大地商業化了。在學問成為逐利資本的時代，雖然我們不知道當今的種種變化是否可以置於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範疇，但至少這些變異與他所提倡的學問之道相左是顯而易見的。

總之，古人已經看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漢書·司馬遷傳》）的現象，原因何在呢？我看就在於他那種傑出史家所獨具的盛世之憂！

四 《史記》中的庶民情結

《史記》雖然被後代人列為《正史》之首，但作者司馬遷的那種庶民立場和百姓情結卻是其他任何一部《正史》都不具備的。

（一）司馬遷所創立之實地考察方法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題為《簡牘學研究的“三重證據法”》的論文，其中強調司馬遷所創建之實地考察的方法在今天仍然適用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司馬遷寫《史記》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因為不限於“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便利條件，親自跑遍了漢朝的大江南北，搞實地調查。他的實地調查大致可分為前後兩階段：

第一階段，在他入仕之前，為了繼承父親的史官，他十歲開始學習古文，二十歲時漫遊全國。在此之前，按照《張家山漢簡·史律》對“史”、“卜”、“祝”的資格要求來看，司馬遷作為史官之子，應該在十七歲成為學童，學三年文字之後已經通過考試取得了史的資格。而具有了這一資格之後的這次旅行，應該說是一次全國範圍的歷史學考察。

他從長安出發後，先到了今天湖北荊州一帶的南郡，由長江溯湘水踏訪了九疑山的舜廟。再由長江至會稽山探訪禹王陵。訪問齊故都臨淄和魯的曲阜，觀孔子遺風。最後，經梁、楚之地返回長安。司馬遷的這次史跡踏訪無疑為他日後寫出不朽名著《史記》奠定了堅實的創作基礎。

第二階段，在他入仕之後，他先做郎官，後來出任太史令，出於職務需要經常跟隨漢武帝出巡各地，正如他自己所說：“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史記·封禪書》）此時的司馬遷更是有機會一邊進行實地考察，一邊撰著《史記》。

總之，當我們感嘆司馬遷具有超人之史學天才的同時，恐怕沒有人會否定重視實地考察對他創作《史記》的重要影響。

（二）司馬遷寫《史記》不僅用手還用腳

實地取材是司馬遷撰著《史記》的重要特色。司馬遷取捨史料的原則在《太史公自序》中有所說明：“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亦即綜合各種儒家經傳、補充以諸子所言之意。可見，採用史料的第一原則是取材“六經”，他曾說過：“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史記·伯夷列傳》）在他看來不載於六藝即六經的內容多不可信。但這不是惟一的原則，他的第二原則是如果六經有闕文而諸子書中有記載的，可以酌情拾遺補闕。

比如關於黃帝的記述雖不見於六經，卻見於諸子。司馬遷採納了後者，為什麼呢？在《五帝本紀》中他對此作了解釋：“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他說諸子書中記載了黃帝，儒家經典中卻沒有記載，到底應該相信誰呢？他走出書齋去請教民間“長老”，結果長老們都說在堯、舜之前還有黃帝，黃帝、堯、舜各自的“風教”本不同。“長老”即老年人。《管子·五輔》：“養長老，慈幼孤。”《漢書·外戚傳》：“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

不僅限於近世，身為儒家的司馬遷對於那些儒者不傳的“遠古”信息，作為史家他寧可相信鄉野“長老”之言“近是”。因為他有一個獨特的編纂方法，即親臨歷史人物、事件的所在地進行調查。

從這一意義上講，《史記》不僅是他關在朝廷圖書館裏用手寫出來的，更是他走進民間社會、歷史事件發生地用腳寫出來的！這一方法應該說同時反映了他重視民間史料重要性的庶民立場！

（三）司馬遷他重視民間史料價值的時代原因

為什麼司馬遷能夠如此重視民間史料的價值呢？其實，這與他所處時代的社會性質是分不開的。

大體上說，從前五世紀末至前二二一年秦統一中國的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大變革時期。其中最主要的是社會性質，已經從周代那種血緣關係宗法分封制，轉變成為了地域關係的皇帝制的郡縣官僚制。此後出現的秦漢時期在皇帝專制主義建立的同時，平民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能力主義”的高揚在打破了以往氏族宗法制血統論的同時，動搖了祖先神的信仰。這一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極大變化：

皇帝在當時是一種嶄新的人物，也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社會成分，他既不同於先秦宗法關係的周天子，也不同於魏晉南北朝貴族關係的各朝皇帝。秦漢皇帝的特點是專制性和平民性。

秦始皇是以武力爭霸粉碎宗法氏族制，從而建立專制政權的，劉邦是中國歷史上由平民搖身變為皇帝的第一人。二人的特點都在於擺脫了來自貴族階層的控制。正是由於皇帝的以上新特点，秦漢的皇親貴族在政治地位上不再具有支配皇權的威力，他們既無法與先秦的公卿大夫相比，也比不上魏晉南北朝操縱九品中正制的皇家宗室。所以一旦他們野心勃發，就會遭到皇權的嚴厲鎮壓和平民的反對。

秦漢的官僚主要是依靠當時所創之文官制度由平民中選拔出來的，由於文官制取代了以往的貴族議事制，此時的官僚士大夫與先秦的公卿士大夫有着很大區別，他們在形式上雖保留着以往“文吏”的職能，但在參政權利上、在代表平民的利益的程度上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秦漢的平民階層在打碎了壓在頭上的宗法制以後，由於衝破了血緣關係的束縛，獲得空前的自由，他們不僅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中，掀起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全國範圍的民衆暴動，從而推翻了歷史上第一個皇帝政權，而且由自己的階層中推出了第一代“布衣”天子。這一時代的平民，人人有爬上宰相、甚至皇帝位置的可能，隨時有評議朝政的自由。

（四）司馬遷對“布衣”的情有獨鍾

時代的巨變必然反映於歷史記述之中，《史記》中就處處體現着“布衣”（穿麻布衣服的庶民）地位的提升，劉邦從“布衣”成為皇帝，韓信、蕭何為首者成為“布衣將相”。

不僅如此，司馬遷還特別強調歷史上名人的“布衣”地位，如《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世家》本是《史記》中用以記載諸王世家的體例，可是司馬遷卻把生前從未封王的“布衣”孔子列入其中，從誕生至逝世記述了其七十二年的人生歷程。在司馬遷看來，孔子雖然並非諸侯而僅僅是個士大夫，但他從孔子為天下制法，傳六藝於後世的意義上，寫了《孔子世家》。

最有意思的是《陳涉世家》。陳涉沒有後代，本無所謂世家。但由於秦亂之時陳涉首開反秦契機，後諸侯起兵才得以滅秦，所以將其列入《世家》。《太史公自序》曰：“天下之端，自涉發難。”司馬遷還在《陳涉世家》中記載了特別代表當時庶民精神的一句名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司馬遷將其與前代作了對比，認為“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因此記載曰：陳涉雖然起事僅僅六個月而亡，但漢不絕其祀，續其血食。

將孔子列入“世家”和把陳涉立為“世家”，在司馬遷來說具有同等的意義：只要對人民有功德，

對創造歷史有貢獻，即便是陳涉這種無後世存續者，也與有後繼之人者同樣對待。

司馬遷在登箕山踏查許由冢時，曾發出感慨：那些沒有天子或諸侯家世相續，僅憑匹夫之身為世人立有功德的人物，無論他們多麼偉大，若無人為其立傳的話，其事跡也無法流傳於後世。即便是許由、卞隨、務光這些公認的古代名人，由於孔子未提到他們，所以他們的事跡都湮沒了。而像伯夷、叔齊，則由於孔子曾經予以讚揚，以致其事跡至今仍在流傳。（《史記·伯夷列傳》）

可見能夠被司馬遷列入“列傳”的人物，都是他認為有必要將其事跡流傳於後世的重要人物。而在這些重要人物之中也不乏布衣庶民的身影。例如，他寫《貨殖列傳》的動機在於：“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採焉。作《貨殖列傳》”。

總之，司馬遷的百姓情節表現為他重視民間傳說史料的真實性，重筆記述人民創造歷史的功德，而這一切又與他所處的古代社會晚期人民地位上升的時代性質互為因果關係。

五 嚴謹獨創的篇章結構

《史記》本名《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魏晉以後始稱《史記》，就是歷史記載的意思。《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主旨的貫徹，不僅來自於司馬遷對史料的博採、精選，還在於他獨創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所謂“五體”結構。所以讀《史記》最好先大致了解一下這部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著作的篇章結構。

（一）“本紀”是《史記》之“本”

本紀是全書之“本”，是《史記》的主幹，其他如表、書、世家、列傳都是“末”，本末不可顛倒，本末相輔相成。所以讀《史記》不可不重視本紀的重要性。要認識到本紀所記人物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脈絡的代表者。

例如作者在全書第一篇的《五帝本紀》即開宗明義地點明我們中國歷史起於黃帝，而且黃帝之後有着唐堯、虞舜的系統。接下來作者寫了《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等，清楚地概括了中國歷史的主幹。然而，司馬遷概括得對不對呢？

其實，對於司馬遷的主張從來就有人表示懷疑，僅以百年來學術史為例：在一百年前殷墟發現之前，有人懷疑《殷本紀》的內容屬於虛構；二里頭夏朝遺址炭十四鑑定結果公佈之前，學界懷疑《夏本紀》真實性的觀點很多；今日如果說有不少歷史學家不相信《五帝本紀》之記載的話也無足為怪。權且拋開學術界對上古史實與傳說的討論，筆者只是覺得如今科學考古能夠一次次地證明《史記》內容的正確性這一點，真是不能不令人對《史記》記載的真實性嘔舌讚嘆！

（二）“表”是司馬遷創立的年代學體例

《史記》載十二本紀之後，設置十表。十表是司馬遷創立的年代學體例，它意味着中國史學已經從《春秋》等著作那種自發地逐年記載，進入到自覺的年代學記述，標誌着中國史學的成熟，意義十分重大。

一般讀者往往不太重視《史記》的十表，所謂“表”的本意是表明的意思，對於歷史上不醒目的事情司馬遷選擇了“表”的形式予以記述。十表中除《三代世表》為世表，《秦楚之際月表》為月表之外，都是年表。表的最大特點是能夠在將大事小情都用簡短的篇幅表達的提綱挈領、經緯清晰。比如：

《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以年為經、以國為緯。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是以國為經、以年為緯。《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是以年為經，以職官為緯，不僅一目了然，而且便於檢索。

宋代鄭樵曾說“《史記》一書，功在十表。”（《通志總序》）讀者在閱讀本紀那種宏觀把握歷史的脈絡內容的同時，就有興趣的地方查一查表，讀一讀表序，是很好好處的。

（三）作為自然科學及藝術史的“書”

八書包括《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等，按今日學科劃分的話，這些都是有別於本紀、表、世家、列傳等人文社會學科的自然科學史、藝術史。其中除了《平準書》外都是講述古今制度變遷的，《平準書》記載了一種新的制度。

按照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宗旨，八書中所述的與禮樂律曆天文地理相關的是天然的文化史，而紀傳表世家的表述的是人文的文化史，史家的責任就在於追究二者之間的關係，《史記》的編纂體例就是如此與作者史學思想之表達相輔相成的。

（四）“世家”所見輔佐王者的股肱之臣

三十世家，記載了那些輔佐王者的股肱之臣，司馬遷認為他們就像三十輻條之共聚一車轂的關係，故“作三十世家”。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的特例之外，主要記載了那些以爵位、俸祿世代相傳的貴族之家。

例如春秋、戰國以來的諸侯世家，再如漢代所封劉姓宗室、外戚世家，以及漢朝所封開國功臣的世家。司馬遷認為“大一統”天下的開創、延續，都是歷代天子、皇帝在周圍“社稷之臣”的輔助之下得以實現的，這些歷史人物的功德是應該載入史冊作為後世楷模的。

（五）“列傳”記載了對人民有貢獻的功臣

在司馬遷的筆下，中國通史宛如一棵參天古樹，不僅有明君、功臣之主幹與繁枝，也有各類為人民做出貢獻的歷史人物，他們成為了證明古樹生命力的蔥蔥茂葉。七十列傳，就是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者而作的。也就是說，只要是扶持正義，不錯過時代需求，有功名於天下者都應該載入史冊。按照這一標準，他為游俠、刺客、醫生、卜者、商人立傳，而不收那些雖然官居要職卻碌碌無為者。

重視某類人物的羣體性是列傳體的一大特色，就是將那些雖處不同年代但具有類似特點的人物列為一傳；具體而言，不僅有《孟嘗君列傳》、《趙公子列傳》那樣的專傳，還有《老子韓非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那樣的合傳。

另外還有以敘述某些人物為主，同時附帶記載另一些人物的主附傳。例如《孟荀列傳》雖以孟子、荀子為主，但同時又列入了騶子、墨子、公孫龍、李悝等。

類傳最大的特色，在於將品行相類的人物排列成傳，如《循吏列傳》、《酷吏列傳》、《游俠列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

總之應當看到，春秋、戰國以後，隨着世卿世祿制的崩潰，中國社會進入了彰顯個人能力的時代，列傳將從刺客到哲人的各類英傑會聚一堂，不能不說是《史記》所創造的最為精彩的體例，後世將《史記》的“五體”簡稱為“紀傳體”，顯然是看到列傳具有不亞於本紀的獨特價值！

六 結語

最後，作為結語，我想提醒讀者在讀《史記》時注意以下三點：

（一）“發憤”並非“怨誹譏謗”

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痛訴自身遭宮刑受辱的慘烈心情時，說過“賢聖發憤之所為作”的話，所以歷代評論者中有人認為《史記》頗有“怨誹譏謗”。

然而清代學者章學誠對此早有過批駁，他認為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曰“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才是“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明確指出：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史記》乃為“怨誹所激發”，是對司馬遷的極大誤解。（《文史通義·史德》）

（二）樸實的《史記》語言風格

《史記》的確有語言樸拙的風格，比如文風不統一，甚至有無法讀通的文句，但那是出於司馬遷不以文害義的原則，以及剪裁史料時留下的痕跡。他大量引用古籍和傳聞史料，重在內容的記載和對原始史料的保留。

比如，《夏本紀》對於《尚書·禹貢》篇除個別文字外幾乎是全文引用。《刺客列傳》中司馬遷引用了《尚書》、《左傳》、《戰國策》的各種史料。《戰國策》的原本本來是較疏漏的，司馬遷引用時也僅取其內容，而未對文字做過多的加工潤色。所以，《史記》的文字水平使人感到參差不齊，甚至有裁剪生硬的痕跡，是不足為怪的。

（三）篇章結構中的深刻寓意

不要忽略《史記》篇章結構的作用，司馬遷是史學家不是評論家，很多對歷史事實的評價，他並不是直接發議論，而是寓意於敘述結構的安排之中。

例如在《儒林列傳》的結尾，司馬遷沒有像其他列傳那樣寫出論贊，而是擱筆於對以學問獲取高官的實例記載。這樣的結尾有其特定的寓意，似乎在告訴讀者他對當時的“文治”政策已無可論贊。

總之，今人讀《史記》，只要能夠理解作者的心境、感情以及全書結構的話，一定會覺得這是一部思想那麼深邃，而又那麼貼近百姓生活，語感那麼豐富多彩的好書！